

真实的历史 永恒的信仰

——专家研讨《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长篇纪实作品《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出版半年来，赢得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誉，持续热销，目前已发行20万册。2月28日，《忠诚与背叛》作品研讨会举行，与会专家对作品的热销原因及其思想文化价值、社会现实影响等进行了深入解读。

文学的力量与温度

□吴义勤

《忠诚与背叛》是一部非常有力量的书，力量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的力量，二是思想的力量，三是文学的力量。从历史角度来说，《忠诚与背叛》涉及的不仅是对历史、对《红岩》的“重写”的问题，我并不认为它是一本“重写”历史、“重写”《红岩》的书。说“重写”实际上把它的意义说小了。我觉得它是一本向历史致敬的书，它跟《红岩》的关系不是重写的关系，而是向《红岩》“致敬”的关系。这本书不是改写了《红岩》，而是以特殊的“致敬”的方式使《红岩》重新获得了生命、重新延续了新的意义。

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常常是会被遗忘的，很多历史慢慢都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或者淹没了，被遗忘的“历史”中当然包括《红岩》这样的文学作品。《忠诚与背叛》某种意义上正是完成了对“历史”的重新唤醒和激活。它跟“历史”或《红岩》的关系，其实就是“互文”的关系，是“虚构”和“非虚构”的关系，是互相对话、互相叙述、互相唤醒、互相成就对方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这个作品，历史被唤醒了，历史所包含的沉重内涵被重新挖掘与激活了，历史对今天时代的意义被延伸和证明了。

从思想角度来说，《忠诚与背叛》所提炼的“忠诚与背叛”的主题，其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思考，对历史、政治、道德、人性、文化的拷问无疑是振聋发聩的。

当然，我更重视的还是这部作品在“文学”方面的力量。我觉得，《忠诚与背叛》是一部能够纠正我们许多关于“文学”本身的思想与认识误区的书。这么多年来，在文学方面，在文学性的认识和文体的认识上，我们一直存在着或隐或显的“等级化”的误区。例如，从文体来说，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的文体序列，常常也会在文学性上“被等级化”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和小说的文学性、诗歌的文学性之间常有一些潜意识的或者本能的等级化认识误区，报告文学常会被视为文学性上的“二类文体”。但是，文学性本身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非此即彼，文学性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综合的存在，不同的文学性、不同的文体的文学性其实并不是对立的关系，不是有你无我的关系，而是“互补”的关系。所有的“文学性”都是我们需要的，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等级关系”。《忠诚与背叛》作为一部报告文学，恰恰为我们反思文学性认识上的误区提供了可能。它所体现的文学性力量，以及其文学性的实现方式、对文学性的综合性和可能性的开拓，值得我们充分重视。在文学性层面，《忠诚与背叛》打动我的，首先就是作品的“温

度”。这是一部有“温度”的作品，语言的温度、情感的温度、价值的温度、历史的温度在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文学应该是有温度的，作家的主体性、语言、情绪等许多元素都会给文学带来温度，文学作品的感染力、震撼力以及对人的触动、教育等等也都源于文学的温度。但一段时间以来，文学的温度却被当成了“文学性”的反面。特别是上个世纪80年代“纯文学”运动以来，我们总是不自觉地追求一种隐藏主体的写作立场，把自己隐藏在事件、人物、故事的背后，不去做价值的判断，主观的判断，甚至在作品中逃离对正邪、是非、善恶、美丑的价值判断。这种所谓的“纯文学性”，曾经让我们欣喜，但也带来了文学“力量感”的丧失。《忠诚与背叛》感染我的就是作品的情绪、情感、价值表达的直截了当和语言的炽热温度，我觉得这恰恰是对于作品作品的文学性加分的。比如叙述到刽子手的残忍，作家愤怒情绪的表述；叙述到烈士牺牲，作家沉痛情绪的表述，可以说是爱憎分明，直指人心，这本身就是语言魅力和语言力量的体现。如果这样的语言被理解为“反文学”，那文学的语言会何等的苍白无力？说穿了，文学语言之所以有感染力，是与人的情感、价值、道德等等分不开的，否则，语言再抒情、再华丽，再典雅，如果离开了情感、价值、信仰、道德这些元素的注入，将注定是空洞而苍白的。语言之外，《忠诚与背叛》的“温度”还体现在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怀上。这是一种有情怀的写作，作品的情怀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说理性的追问、历史的还原、人性的拷辩等等，也包括对现实的警醒。虽然在写历史，但作家时刻在思考着现实，包括“忠诚与背叛”这个主题的提炼，它既是哲学命题，又是一个人性的命题。因此作品里面提到的关于党员的纯洁性问题，包括干部制度的问题，都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是它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忧患的情怀，它本身达到的温度足以给我们启迪与思考。此外，《忠诚与背叛》还有着人性的“温度”。作品对于人性的复杂性有着深刻的思考和认真的建构。正如许多评论家谈到的，不仅仅对叛徒的人性解剖有深度与力量，而且对英雄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的呈现也充满文学的温度。在英雄的塑造上，除了作家对人物信仰坚强方面的表现令人感动之外，对英雄人物诗性一面的呈现与挖掘尤其令我震

撼。在监狱里面，在生与死面前，英雄的诗性气质令人难忘，他们写了那么多的诗歌，在墙上写，在草纸上也写，他们朗诵诗，他们交流诗，他们是革命家，是英雄，但更是诗人。作为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独特的人，是有文学性或者文学温度的人。

在文学方面，《忠诚与背叛》还有许多艺术层面的追求值得我们重视，特别是作家对许多传统文学元素与文学技巧的创新性的发现和运用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典型化的问题。典型化是很传统的文学方法。在本书中，作家的典型化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历史的哲学和理性的思考。可以说，是思想的升华与典型化。即从《红岩》出发，或者回到历史的现场，我们能够从思想上挖掘什么东西、提炼什么东西。二是对人物典型化的处理。英雄也好，叛徒也好，特务也好，这么多人物，这么多正反面上的人物，要让每一个人物都在文学上“立”起来是很困难的，必须充分调动和运用各种典型化的手法。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之所以能够让每个人物都拥有他自己的文学性或者典型性，彼此之间能够区别开来，能够证明自己作为一个文学人物的价值，与作品丰富的典型化技巧的运用有很大的关系。这方面，作家的探索提供了很多成功的艺术经验，这些经验不管是对报告文学也好，或者对纯文学也好，都是很宝贵的。再比如文本的叙述和结构方面，《忠诚与背叛》对叙述和结构的探索也是很成功的。作家对叙述有精心的安排和精心的追求。首先是视角的变化。如果说单纯从历史挖掘的角度来说，这么多的英雄，还有这么多的反面人物怎么叙述，怎么前后不重复，怎么让人感觉到读起来不沉闷，而且拥有吸引人的可读性，甚至畅销，我觉得与作品叙述视角的不断变化有很大关系。作品写到不同的人物，英雄人物或者反面人物，它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既有内视角，也有第三人称分析性的外视角，这既给文本的叙事带来了变幻的效果，同时也更有利于进入他所写的人物的内心世界。其次是语调的变化。这部作品的语言在不同层面的语调、语气也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的段落，在讨论不同问题的时候，语气跟语调的变化不仅有助于表达思想、塑造人物，也能够带给小说很强的文体“温度”，从而呈现文体魅力。

诗意的言说

——读《叙述的交响——王蒙的小说创作与音乐》——

□龚奎林

除、梳理、比较和分析，从众多个案中准确捕捉独特价值，既有从宏观、总体和横比的角度去审视王蒙小说的音乐特性，又有从微观、个案和纵比的角度去考察具体的文学文本，从而使得论著逻辑清晰，论证严密。在以下三个维度呈现独特的创新性。

一、宽广的学术视野与敏锐的问题意识

作者汲取古今中外、历史当下的文论精华，把眼光从当下延伸到历史当中，从小说延伸到音乐当中，去思考音乐何以可能的問題，从而触摸历史转折下王蒙小说转型的细微碎片，从碎片的缝隙中寻找音乐与小说接轨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学术视野非常开阔。对王蒙的小说与音乐的关系也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她对研究现状进行了非常详实的描述与勾勒，从西方文论与国内学者的研究现状两个维度认真梳理各自的优劣，也对其遮蔽的一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有关王蒙小说的研究，成果丰富多彩，但相对王蒙小说本身的丰富与复杂而言，研究仍然留有不少新的研究空间，尤其是从音乐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尚待在上述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和突破。”因此，在这种问题意识的指引下，祝欣深入挖掘，利用音乐表现元素和表现方式、方法和小说叙述的同构性，对王蒙小说具有代表意义的形式层面、内容层面、意义层面的音乐性进行剖析，揭示出王蒙小说复杂、丰富的音乐蕴涵，通过对不同时期的作品细读，梳理出王蒙小说的音乐性的发展轨

迹、基本走向和历史变迁，触摸王蒙小说的内在文化精神和心理结构，发现在精神上、人格上、文化上、政治上多声部“杂色”的王蒙的小说所折射的多元、多层意义，系统解读王蒙小说与音乐的关系，从文本的外在形式抵达内在意义的表达。所以，祝欣的研究也就从两部分展开，先考察王蒙小说中所涉猎的音乐内容及其思想文化内涵，再对小说的音乐性究竟对王蒙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带来什么影响进行探讨。

二、资料丰富、笔力灵动

祝欣首先是位诗人，对语言非常敏感，同时又是一位科班出身的音乐家，文学气质与音乐细胞纠结在她的内心深处，使她在现实人生的诸多无奈行走的同时拥有了纯净的梦想，那就是在文学与音乐之间寻找一条途径，以抵抗世俗的诱惑，这又是一般研究者所无法完成的，或者说，祝欣带着一种诗意去寻找人生立言的影子，这使她选择了王蒙作为其研究对象。王蒙在小说创作中引用了许多中外音乐和乐诗。祝欣对王蒙的小说所引用的音乐进行了统计，达200余处。正是从广泛收集、梳理、分析小说文本中音乐资料和其他非文学文本中的作家音乐关系资料入手，作者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剖析与综合研究，资料丰富，论证细致，笔力灵动，凸显出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力及音乐文化功底。因为王蒙与时俱进，产量颇丰，梳理王蒙小说的音乐资源本来就比较麻烦，更重要的是梳理出这些东西之后使作何用。

观点撷英

翟泰丰：永恒的信仰的力量

报告文学一定要真实，然后在真实中去做艺术的关照、审美的关照，去寻找真实和艺术的文学的结合点，这部作品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好。作品有思想高度，让人看了受鼓舞，给人力量，就是因为经过哲学、哲理的思考，走进人的灵魂深处，寻找可贵的东西，把人物写出来，站在如此高度才能使作品感人。

《忠诚与背叛》最可贵的地方，与其他小说、电影、电视剧的区别之处就是，它真正走进了人们的灵魂，走进了人们的心灵，这是作者寻找心灵哲理性的结果。信仰是中华民族永恒的力量，《忠诚与背叛》就写了这样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把历史的经验吸收在今天，让人们从历史的忠诚中吸收力量，化作永恒的忠诚。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民族，忠诚于人民，这是我们民族永恒的信仰的力量。

王巨才：还原真实的红岩

《忠诚与背叛》为什么会受到这样高度的重视，得到这么高度的评价，我觉得是因为两点：

一是它准确地触摸了我们的社会情绪，表达了关于如何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样一种愿望，这与党中央的精神是一种契合。《忠诚与背叛》正是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教训，从红岩故事的剖析向大家提出了一个如何保持组织的纯洁性、如何保持每个人党性的纯洁性，做到永远忠诚、永远不背叛的问题。这本书的思想价值就是通过红岩故事的回顾、解说，通过反思给每个党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二是有力地回应了当下方兴未艾的红色文化热，是对红色经典的一种深度的展示和弘扬。《红岩》小说无疑是经典的，但是小说是在特殊的历史年代，在一种特定的读者观念、特定的写作范式的背景下创作的，它无疑是张扬理想主义题材的杰作。这本报告文学，就是在小说的基础上，围绕小说有关的内容，包括对史实的发掘、背景的考证、人物的寻访、事件的梳理等，再现了历史的完整面貌。小说和报告文学绝对是跨越时空的很好的回应，就像一个宏大的交响乐。小说是以情感人，报告文学是以理育人，通过作者的一系列工作，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红岩。跨越时空50年，两部作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共同谱写了一段难忘的历史，构成了内在的呼应，内在的契合。

高明亮：深入理解红岩故事

关于红岩这个题目，我最早接触到的是《烈火中永生》，第二才是《红岩》这部小说。如果打个比方，给我的感觉《在烈火中永生》好像告诉人们这儿有一个金矿，很动人，但是故事比较简单，内容也比较单薄，《红岩》在这个基础上成为一部长篇小说，这部长篇小说教育了几代人。当然任何一部经典也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给我的印象，《红岩》这部小说告诉了我们那些英雄的事情，告诉了我们先烈们可歌可泣的精神，也贬斥了叛徒的嘴脸。但是我看了《忠诚与背叛》以后，反过来想《红岩》，觉得《红岩》更多讲了“果”，但在“因”上不那么充实，看了《忠诚与背叛》以后，让我了解到原来那些忠诚是这样形成的，那些背叛也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叛徒也有复杂的心路历程，所以我觉得《红岩》和《忠诚与背叛》是相得益彰的，看了《忠诚与背叛》感到《红岩》的“果”是可信的，看了《忠诚与背叛》又了解到《红岩》的精神是怎么形成的。

桂晓风：文学经典的再开发

文学如何在经典的基础上学习和重写脍炙人口的作品？《忠诚与背叛》非常好地处理了这个问题，已经有了脍炙人口的经典，针对这个题材进一步开发，这确实是在新的时代下，对我们珍贵的精神财富的再研究、再认识、再展示、再传播，而这样一种再开发、再研究、再传播，站在前人的基础上，也利用了前人没有具备的资源，通过现代的观点、现代的资料、现代的手段，更加完整深刻地再现这段历史。



2000年除夕那天，我把一本崭新的小说集《蓝色迷情》赠送给王欢，因为正月初一就是他18岁生日。这本集子是一套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我不仅是这套丛书的主编，还为这套书写了总序，我当然有理由把它作为礼物送给王欢，他从小就是我非常熟悉的孩子。内向，有灵性，善于思考，这是成年的他又留给我的印象。

这本小说集的出版，大概给王欢带来了好运气，那年他如愿考取了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本科。戏文系不仅为影视界造就出很多实力派编剧，也是作家的摇篮。如果我没记错，当年的乔雪竹、陆星儿、肖复兴、宋晓平等不少人都是从这里步入文坛的。进入大学的王欢像一块投入炉中的生铁，在冶炼中获得了全新的再造。四年专业编剧的训练，让他初步构筑了自身的文学理念。他参加了电视连续剧和电影文学的创作，还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诗歌。毕业那年，他创作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爱曾如海，浪也白头》，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部小说，因为男主角是以我的一位摄影家朋友为生活原型。女主人公麦晴是一位从小地方来到现代化大都市谋求生存的优秀女孩儿。带着开拓人生的美好梦想，她走进了奢华的大都市，也进入了男人们欲望的视野。为了报复两个男人的玩弄，她潜心设局谋杀，在自己钟爱的摄影事业迫近成功之时，令人悲哀地放弃了生命。这部小说的问世，把王欢同同一代人的思维模式中分化出来，他没有利用文学的主张宣泄自我精神的表述，而是以冷峻客观的态度直面人欲横流的现实社会。

10年前我写过这样一段文字：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不可互相替代的岂止是历史的位置，更多的是不同色泽的光芒和青春。王欢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春内幕》，则他以独特的思考方式和艺术直觉，准确地选择了一个诠释平台，去透视去解析同一代人的生命内幕。小说通过主人公林幻在艺术院校成长的特殊经历，以技艺娴熟的笔法向人们娓娓道出一部青春的传说，然后又以形象、细腻、生动的文字，解析这一特殊群体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的种种悬疑。恋爱与奋斗，几乎是所有青春小说的主题。《青春内幕》不同的是让主人公林幻从师中国武术的传奇经历，始终贯穿着小说的全过程。与出神入化的金庸大师相比，这部小说对有关武术场景的描写更真实了许多。面对复杂的社会与充满挑战的人生，青春的选择、爱与欲的分野、艺术的缤纷梦想，都必然在书里书外的年轻人心里，萌动出不同的信念，生长出理想的活色。

如果划分，王欢理当列入“80后”作家的群体。“80后”是城市独生子女高峰年代的产物，他们有着与父辈截然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历史背景。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审美、他们的价值取向、他们的人生观在《青春内幕》这部小说中，得到了形象深刻的白描和坦诚率真的自我表述。但这部作品也通过对浅草、高蕊、唐婉、雨木的精心刻画，客观地揭示出这一代人的性格和人格，在不同环境中有着不同程度的偏执和缺失。因为这四个女孩儿在四个不同的起点上，都与主人公有着超越性别的精神对话，然后把一切归复到爱情的永恒主题。其实这部小说颇值得关注的另一点是，王欢通过林幻历经坎坷历练随成大成才的故事线索，对中国传统武术进行了大胆全新的探索。

王欢是一个创作态度严肃的青年作家，但要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优秀作家，还要付出百倍的艰辛和努力。我和喜爱他的读者一样，真诚地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读小说集《青春内幕》——

□高洪波

人生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文艺包括文学和艺术，文学和音乐都是人类创造性精神劳动的艺术，都在于表现人类最为复杂微妙而丰富深刻的思想情感和真善美的良好人性，只是各自的艺术手段不同，音乐是通过声音符号的组合来表达创作主体的思想，而文学是通过语言文字符号的组合来表达创作主体的思想。音乐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可以说，音乐是流动的文

学，文学是凝固的音乐。不仅仅诗歌与音乐关系密切，就是小说这类叙述文体也与音乐有了不解之缘，当代小说家王蒙的作品就是此中的代表。王蒙的小说创作，从上世纪50年代的《青春万岁》《夜的眼》《海的梦》《春之春》《风琴飘带》《蝴蝶》，再到90年代中后期的“季节”系列和本世纪的《青狐》等，无论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还是在主题上的深化与推进，都可以看到音乐的痕迹。作为当代文坛的见证人和常青树，王蒙本身就是新中国文学史的缩影，研究他也就是研究新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变迁。而音乐一直贯穿在王蒙的文学创作中，王蒙曾自述道：“我喜欢音乐，离不开音乐。音乐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我的作品的一部分。有时候是我的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头等重要的部分。”“从整体来说，我在写作中追求音乐，音乐的节奏性与旋律性，音乐的诚挚的美，音乐的结构手法。”（王蒙：《音乐与我》，《中国音乐教育》，2002年第2期）俄罗斯古典音乐、前苏联的革命歌曲、中国西北少数民族音乐，甚至好莱坞的电影音乐、西方现代主义音乐成为王蒙获取精神与文化素养的主要来源，音乐构成了王蒙小说的创作资源和内在艺术表现。祝欣以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系统化的前瞻视角研究王蒙小说与音乐性的关系，凭借自己阅读汲取的营养智慧所建构的一种主客逻辑关系，将宏观与微观、总体与个案、内部与外围等多种方法相结合并加以交错渗透，对大量材料进行剔



换句话说，如何从这堆材料中提炼出有价值的观点来，这才是重中之重。祝欣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到位，给人以高耸建筑之感，材料与论断相互印证，丰富而深刻。浓缩的聚焦、深邃的评论，再加上丰富资料的佐证，确证着论著的真确。

三、方法上学科交叉、史料分析与文本阐释并重

当下许多学术名著在方法上或偏重于史料梳理或偏重于理论观照下的文本阐释，尽管所论都成一家之言，但是略显单薄，容易忽视文本话语与理论话语之间的距离与缝隙。而祝欣深入当代历史的具体情境，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学科交叉、史料分析与文本阐释，充分考察王蒙小说排

徊在音乐、文学和历史之间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多样性，从历史中进入文学，从音乐中反观文学，以客观充实的论据在思考的言说缝隙中回旋，从而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结论，有力地支撑起新颖独到的理论框架和观点，而严谨的逻辑论证和准确的史实描述也极大地增强了论著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作者本人音乐与文学的学科交叉使得专著具有了创新性，打开了学科封闭的边界。祝欣的专著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理论观照下的文本阐释，第二部分是资料梳理下的实证研究。第一部分谈论的是“音乐性与王蒙小说的形式创新”，作者梳理了丹纳、克莱夫·贝尔、巴赫金、米兰·昆德拉、苏珊·朗格等系列文论的学理资源，概括出王蒙半个世纪小说创作的三个阶段。作者运用音乐中奏鸣曲、交响曲和变奏曲等各种艺术样式，分析上世纪50年代和90年代王蒙小说的音乐结构，借助间奏曲、随想曲、狂想曲等音乐艺术样式，分析新时期王蒙中短篇小说的音乐结构。祝欣娴熟地运用不和谐音、情绪、色彩等音乐元素分析王蒙经典小说中的语言、修辞乃至人物性格因素，研究方法新颖，不仅体现出一个学者的理论素养，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深厚的音乐功底和文本理论阐释的能力。第二部分是外部的、实证的研究，作者借助深厚的史料钩沉功夫和文本细读能力，把王蒙小说的各种音乐资源从王蒙的口述、自述、自传、创作和他述等各种史料中广泛收集、梳理出来，在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剖析与综合研究，认真归纳出王蒙小说与音乐结缘的发生、发展、演变和更新的渊源和规律。

总之，祝欣正是以扎实的功夫、厚重的笔力，用翔实的资料、精湛的论说、入微的剖析给人们展示了当代文学发生发展时音乐与小说胶着的张力结构。论著资料丰赡，论证细致，从而提供了一种融史论、文本解读、中西文论对话、文化研究与时代语境为一体的交叉学科研究范式。